

第一章 导 论

〔内容提要〕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福利。福利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是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而应用福利经济学更是必须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应用福利经济学应用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国情，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福利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及其政策措施。

第一节 福利经济学及其产生和发展

一、福利与福利经济学

福利分为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个人福利是指一个人获得的满足，它可以看作是“幸福”或“快乐”的同义语，这种满足既包括个人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也包括个人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社会福利是指一个社会全体成员的个人福利的总和或个人福利的集合。在社会福利中，能够直接或间接用货币来衡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叫做经济福利。经济福利就是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书中社会福利是指一个社会的经济福利。

福利经济学 (Welfare Economics) 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西方经济学家对福利经济学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早期的福利经济学家把福利经济学说成是研究社会幸福及其变化的经济原因的科学。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庇古 (A. C. Pigou) 认为，福利经济学“研究增进世界的或某一国家的经

济福利的主要影响”。^① 后来的福利经济学家多从另一角度给福利经济学下定义。英国经济学家李特尔 (I. M. D. Little) 认为, “最好是把福利经济学看成是研究经济体系的一种形态比另一种形态是好还是坏, 以及一种形态是否应当转变为另一种形态的问题。”^②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 (Paul A. Samuelson) 给福利经济学下的定义是: 福利经济学是一门关于组织经济活动的最佳途径, 收入的最佳分配以及最佳的税收制度的学科。^③

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是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在什么条件下达到最优状态? 如何才能达到最优状态? 其二是国民收入如何进行分配, 才能使社会全体成员的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

由于资源的最优配置意味着“效率”, 国民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意味着“公平”, 所以“公平”与“效率”既是福利经济学所追求的基本社会目标, 也是它的基本政策目标。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 福利经济学是研究一个国家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 以及在这二者之间如何进行权衡选择的一门学科。福利经济学家一致认为, 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是增进社会福利的基本途径, 至于收入均等化是否是增进社会福利的必要条件, 福利经济学家们仍然见仁见智, 意见不一。

在市场经济制度下, 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都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的, 因此, 福利经济学把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市场机制的功能缺陷进行评价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通过分析市场经济制度的缺陷, 福利经济学提出如何通过政府的作用及其相应的政策措施纠正这些缺陷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福利经济学试图利用他们所提出的道德标准和福利理论作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概括地说, 福利经济学是从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这两个方面来研究市场经济国家实现最大的社会福利所需要具备的条件, 以及为了增进社会福利所应当采取的政策措施的经济学的的一个分支。

二、福利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19 世纪 20 年代, 适应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等状况的需要, 哲学中的一个派别——功利主义或效用主义 (Utilitarianism) 在耶利米·边沁和詹姆斯·穆勒等人的影响下逐渐流行了起来, 并成为当时心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中的一种

① 庇古:《福利经济学》, 1932 年英文版, 第 733 页。

② 李特尔著, 陈彪译:《福利经济学评述》, 商务印书馆 1966 年版, 第 304 页。

③ 参见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经济学》, 英文第 13 版, 第 748 页。

主流的意识形态，西方福利经济学也开始形成以效用主义为主的伦理道德传统。效用主义认为，人们道德行为的目的应该是个人自身福利的提高，这样做时，人们只考虑他个人的福利，社会行为的目的应该是最大限度地获得普遍的福利，或者应该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效用主义反对歪曲个人福利，反对把社会福利仅仅看作是国王、贵族和教会等一部分特殊人群的利益。

西方经济学中的这一伦理传统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边际主义革命时期被很快地丢弃了。

19 世纪 70 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边际主义革命。革命引入了边际概念，使西方经济学能够很容易地处理增量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形式也变得简洁优美。结果，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变成了对边际效益等于边际代价的论证和说明，整个西方经济学界被吸引到了研究资源配置的问题上，而伦理方面的问题却被丢在了一边。因此，虽然边际主义革命在西方经济学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促进了西方经济学对资源配置问题的解决，使数学在西方经济学中得到了成功的应用。但是，不可否认，边际主义革命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资源配置问题的解决使西方经济学几乎变成了工程学，所有人都被假定为理性人，所有的西方经济学问题都成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的效用函数最大化，至于效用本身有什么性质、个人效用与其他人的效用以及与整个社会的效用有什么关系，则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都不去考虑，他们都成了地道的工程师。这样，西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丢掉了伦理学的传统，福利问题不再被关注，西方福利经济学走入了低谷。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 20 世纪初。

20 世纪 20 年代，旧福利经济学的产生打破了西方福利经济学发展的沉寂。1920 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出版了代表作《福利经济学》，标志着旧福利经济学的产生，福利经济学重新受到重视，庇古也因此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认为：个人的福利可以用效用来表示，整个社会的福利应该是所有个人效用的简单加总。在此基础上，庇古提出了两个福利基本命题：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社会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就越大。庇古还定量地分析了当时英国社会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例如税收等。

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其主要特征是：（1）经济学是解决物质福利（Material Welfare）问题的。（2）使用物质福利来表示效用概念。这样的效用概念基本上等同于生产能力，如人的健康状况等，它与人的生产能力有关，进而与经济效率有关。因此，这样的效用概念是客观的。（3）继承了英国效用主义伦理学的传统，认为个人的效用是可以用基数来度量的，是可以进行

人际间比较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但是，旧福利经济学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旧福利经济学以基数效用理论为基础，而当时的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是不可以用基数来度量的；一个人的效用和另一个人的效用是不能够进行比较的；适用于所有人的基数效用的度量单位是不存在的，尤其是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意味着富人的货币应该转移一些给穷人，西方经济学家们最为忌讳；等等。这些问题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引起了一场大争论，争论的结果是新福利经济学取代旧福利经济学。

当时大争论的焦点是关于经济学分析中要不要规范分析、要不要加入价值判断的问题。这场争论以罗宾斯的胜利而告终。罗宾斯（1932）认为，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结合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经济学不应该涉及伦理的或价值判断的问题；经济学中具有规范性质的结论都来自基数效用的使用，因此经济学应该避免使用基数效用。罗宾斯的观点很快流行起来。不久，约翰·希克斯从帕累托的原始理论中发现了能够使福利经济学避免基数效用的思想——这就是对两个社会状态之间的福利进行比较的思想——并把它加以重新表述，成为了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帕累托标准。在帕累托标准的基础上，希克斯和艾伦发展出了帕累托经济学或新福利经济学。因此，布劳格把新福利经济学的流行称为“希克斯—艾伦革命”（Hicks—Allen Revolution）。

新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征是：（1）经济学是解决稀缺性问题的。（2）使用偏好来表示效用概念，相对地更具有主观性。（3）只使用序数效用，避免效用的人际间比较。（4）普遍使用帕累托标准及有关的边际条件。（5）关于补偿检验的争论。（6）伯格森对社会福利函数的讨论。

那么，为什么帕累托本人没有在自己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新福利经济学体系呢？Cirillo（1973）认为，帕累托本人很清楚，他所提出的标准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它使用序数效用，避开了价值判断问题，但它只是一个关于效率的标准，根本不涉及分配问题；而对福利问题的分析必定离不开分配问题。因此，这一标准对福利研究的意义并不大。Cirillo 认为，帕累托这么想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帕累托一向认为：经济理论只能解决部分的而不是全部的问题；如果经济学家坚持严格的实证方法而不去分析分配问题的话，那么，他们就是放弃了对福利问题的研究。因此，所谓的帕累托标准在帕累托本人看来根本没有什么重要之处。而这一点，西方福利经济学界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才认识到。

西方福利经济学在经过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徘徊时期之后，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进入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阿玛蒂亚·森的重要研究成果为起始标志。

流行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福利经济学在五六十年代受到了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所带来的严重质疑。作为新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帕累托标准有一个缺陷，即它只是一个关于效率的标准，根本不涉及分配问题。新福利经济学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采取了两种办法：一种是提出了其他的福利标准，但是对这些标准的争议较多；另一种是提出社会福利函数。社会福利函数（Social Welfare Function）是新福利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试图指出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应该考虑哪些因素是某些人的利益或效用，还是所有人的利益或效用？当人们之间的利益或效用相冲突时，应该如何处理这些不同的利益或效用？遗憾的是，阿罗于 1951 年提出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指出：阿罗所定义的社会福利函数即阿罗社会福利函数是不存在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使西方福利经济学家们重新对古老的社会选择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并试图寻找避免悲观的不可能性结论的方法。“围绕阿罗的结论，福利经济学中一个全新的领域（社会选择理论）已经发展起来了。”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研究有了重大进展，阿玛蒂亚·森等人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导致不可能性结论的原因，即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只适用于投票式的集体选择规则，该规则无法揭示出有关人际间效用比较的信息，而阿罗式社会福利函数实际上排除了其他类型的集体选择规则，因而不可能性的结果是必然的。阿玛蒂亚·森的研究实际上说明：新福利经济学取代旧福利经济学的功过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采用序数效用的新福利经济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揭示了这种缺陷：在缺乏其他信息的情况下，只使用序数效用提供的信息进行社会排序是不可能的，因为序数效用无法提供相对充分的人际间效用比较方面的信息；而使用基数效用却可以获得人际间比较方面的充分信息，从而可以得出一定的社会排序。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西方福利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而向效用主义和基数效用理论的回归趋势则是这一时期的主流，例如新古典效用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的提出等。阿玛蒂亚·森于 1998 年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方面说明阿玛蒂亚·森的理论贡献；另一方面也说明：西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已经成为整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且已经受到了整个西方社会的普遍关注。相信在未来，西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必定会对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

第二节 应用福利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内容

一、应用福利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西方经济学家按照经济理论是进行实证（或事实）表述还是进行规范表述（或价值判断）把经济学区分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描述经济事实和经济行为，它是研究“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的科学。比如，当前失业率是否过高？多少人处于贫困状态？征收物业税对中等收入者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是实证经济学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正确，可以依据经验或事实来进行检验。所以，实证经济学中的命题和结论是可以证实或证伪的。

规范经济学包含道德和价值判断，它用一定的道德标准来评价经济事实或经济行为是“好”还是“坏”，是研究“应该”或“不应该”的科学。比如，政府应该建立失业保险吗？应当通过提高税收或减少开支来削减财政赤字吗？对于这些问题无法用事实来作出回答。这些问题是由政治决策而不是由经济科学来解决的问题。

福利经济学是哪一类呢？目前人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是规范研究。但我们认为，福利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是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而应用福利经济学更是必须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对中国人来说，福利经济学还是“舶来品”，应用福利经济学不仅要把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还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这样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由于市场经济的共性，我们可以充分引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但若想成功地把这些基于与我国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上的成熟的市场经济理论框架直接套在中国的经济现实上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我国经济学者一方面要完整地把握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注意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态度；另一方面要在扬其长、避其短的充分利用西方经济理论分析工具的基础上，大力强调实证研究精神。惟有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进行认真的、全方位的实证研究，运用已有的西方经济理论分析工具，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才能创立起能概括我国非成型、非规范态、极具特殊性的经济现象与问题的范畴、概念和理论模式，并借此建立起能合理解释、预测和指导我国经济实践的

经济理论框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经济学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规范经济。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初创时期，应在一开始就规范运作，规范经济研究也十分重要。但这些规范研究的方法不是我国传统的规范法，而是与实证法协调互补、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规范法，规范研究的前提假设都应当是经过实证检验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曾经过分强调精神力量传统的国度里，对价值判断等规范的前提更应注重实证检验。

现在，我们要向西方学习实证研究方法，固然要把握其引入数理统计学之后发展起来的严密的形式，更重要的是把握其实证精神。这种务实精神体现在经济理论研究当中，就是实证研究方法与规范研究方法互为基础、协调互补、融为一体，共同构建中国的应用经济理论体系。

二、应用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如前所述，应用福利经济学应用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国情，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福利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及其政策措施。其基本内容涉及个人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福利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所必须的条件以及如何才能达到这些条件，对市场经济的运行状况和市场机制的优缺点进行评价，为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采用什么样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在这些研究中，既有现代福利经济学基本理论的阐述，也有经济事实和经济行为的描述，还有好或坏的道德判断。什么样的政策措施是好的，什么样的政策措施是不好的，福利和道德标准是无法分开的。本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理论与应用之间的相互作用。

本书共十一章，除本章之外，第二章阐述了应用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章阐述了社会福利经济制度，第四章至第十一章阐述了应用福利经济学的一些突出问题或热点、难点问题，如收入分配、贫困、教育、失业与就业、人口、环境、社会保障等。我们相信，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理论界、决策层深化对现代福利经济学的认识，更好地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福利制度变革，推进实践的发展。

[本章小结]

福利分为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的经济福利。庇古的代表作《福利经济学》标志着旧福利经济学的产生，在帕累托标准

的基础上，希克斯和艾伦发展出了新福利经济学。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西方福利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未来西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必定会对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

福利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是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而应用福利经济学更是必须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应用福利经济学应用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国情，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福利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及其政策措施。

[思考题]

1. 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2. 应用福利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3. 新福利经济学与旧福利经济学有何不同？

第二章 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内容提要〕介绍福利经济学所包含的基本概念，如效用、福利、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函数等；系统阐述帕累托标准、帕累托最优和补偿原理；在分析了完全竞争市场的合意性之后，引出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考察阿罗不可能定理和社会福利函数的类型，并对垄断、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等市场失灵现象所导致的福利损失进行了分析。

福利经济学从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及其相互联系的角度出发，考察一个社会全体成员的社会福利问题，主要从资源配置效率和国民收入分配两方面研究一个国家实现最大的社会经济福利应具备的条件和国家为了增进社会福利应有的政策措施，包括效率标准、分配标准以及社会最大福利决定等内容。

第一节 效用、福利和消费者剩余

一、效用和福利的基本含义

效用（Utility）是指消费者从消费某种物品中所得到的心理满足，是商品或劳务满足人们欲望的能力。任何一种物品的效用不仅在于物品本身具有的满足人们欲望的客观的物质属性（如面包可以充饥，衣服可以御寒），而且它有无效用和效用大小，还依赖于消费者的主观感受。例如，一个人在很渴的时候，水对他来说就具有很大的效用；但当他不再渴时，水对他来说就不具有效用，或者效用很小。但是，效用（Utility）有时用来代表客观的选择或偏好。另外，效用在伦理上是中性的，因为衡量一种商品或劳务是否具有效用，只需

要看它是否能满足人的欲望，而并不需要评论这个欲望是好是坏，被满足的欲望可以是一种无聊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欲望。

一般来说，随着所消费的物品或服务的数量增加，个人需求的满足程度（即效用）会增加，但随着个人消费的某一种物品的数量增加，最后一个单位物品所带给消费者的效用是递减的，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则。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规则只是对物品的消费适用，能否适用于收入（货币）的拥有量存在争议，即收入是否具有边际效用递减规则不普遍认同。

通常，对效用的测量有两种方法：一是基数效用，认为效用可以用确切的数量衡量，每个人都可以给出他自己对不同物品的效用函数，这是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也是讨论收入再分配的合理性的基础；二是序数效用，认为效用是不可以具体量化的，但可以分出强弱程度，列出顺序，进行比较。序数效用论者认为，尽管效用的实际测量存在困难，但可通过偏好或选择外显其强弱程度。序数效用是新福利经济学的基础性概念。

所谓“福利（Welfare）”，庇古（A. C. Pigou）认为，一个人的福利寓于他自己的满足之中；这种满足既可以是由于对财物的占有而产生的，也可以是由于其他原因（如知识、情感、欲望等）而产生的；一个人的全部福利则应该包括所有这些满足。庇古又认为，含义如此广泛的福利是难以研究和计算的。为此，他把研究的主题局限于能够计量的那种福利，即与经济生活有关的、能够直接或间接同货币量有关的那部分社会福利。^①以货币计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被称为经济福利，“效用就意味着满足，一个人的经济福利就是由效用构成的。”^②另外，黄有光指出：个人福利可以“看作是一种个人的幸福（Well being），或更明确地说，是他的快乐。快乐的有无可以归结为肉体上的愉快和痛苦，及精神上的愉快和痛苦。”^③我们认为：福利是人生在世的各种各样的欲望或需要所获得的满足和由此感受到的生理的或心理的幸福（Well being）或快乐（Happiness）。所谓幸福或快乐可以看作是使用价值或效用，它涉及人的物质生活的需要，诸如音乐艺术的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夫妻朋友的爱情和友谊，以及“自由”、“平等”、“公正”、“安全”乃至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等。

社会福利是指社会成员中个人福利的总和。由于个人效用有序数效用和基数效用之分，相应地，社会福利也有向量和矢量之分：（1）社会福利的向量概念，认为社会福利是所有社会成员个人序数效用的向量。社会福利增进与否只能

①②庇古：《福利经济学》，1932年英文版，第11页。

③黄有光著：《福利经济学》，中国友谊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比较全体社会成员的变好或不变，而不能比较一部分成员变好，另一部分成员变坏的情况。(2) 社会福利的矢量概念，认为社会福利是所有社会成员个人基数效用的加总。社会福利增进与否可以比较任何一种社会成员的个人效用变化。

那么，效用和福利究竟有没有区别呢？显然，庇古把福利等同于效用或效用的子集，黄有光则指出：“由于对别人福利的考虑，由于无知，由于非理性，福利会偏离效用（或偏好）”，^① 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森（A. K. Sen）等。黄有光认为福利和效用的偏离主要由于以下原因：^②（1）个人的偏好不仅受他本人福利的影响，而且也可能受他对于别人的福利考虑的影响。换句话说，偏好可能大体上照顾自己的快乐，但在某些程度上他也可能会照顾其他人的福利。例如，出身地主的早期共产党人为了民众的福利偏好参加革命，父母为了子女的福利情愿牺牲自己的快乐等。（2）由于无知或不完善的预见，偏好可能不同于福利。例如，有些人为了上班方便，偏好买车，但发现买车后，交通堵塞，结果上班更不方便。这时，偏好和福利发生偏差。（3）非理性偏好。如果有人偏好某些会减少自己福利的东西，但这种偏好不是由于“无知”，也不是为了他人的福利，那么就可把这种选择称做“非理性”的。例如，抽烟吸毒会降低个人福利，但有些人却偏好它。

效用和福利尽管在有些情况下会出现偏差，但福利经济学还是假定在一般情况下，每个人是他自身福利的最好判断者，并且力图使他的福利最大化。或者说，效用和福利在重要方面是等同的，如福利的可测性和效用的可测性问题。

二、效用的可测性与人际间的可比性

基数效用论的代表人物，如德国的戈森（Gossen）、法国的瓦尔拉斯（L. Walras）等经济学家指出，效用是可以度量的，其大小可以用基数 1、2、3……等具体数字来衡量并加以计算和比较，且边际效用具有递减规律。例如，消费者消费 4 块面包的效用可分别表示为 U_1 、 U_2 、 U_3 、 U_4 单位的效用，那么， $U_1 > U_2 > U_3 > U_4$ 。而将这些单位的效用加总起来就可得到消费面包的总效用（Total utility）。庇古认为，效用意味着满足，而满足可以用“一个人为了避免失去某种满足或快乐而愿意支付的货币量来计量”。^③ 并且，庇古

①黄有光著：《福利经济学》，中国友谊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 页。

② 同①，第 11～13 页。

③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几个方面》，载《美国经济评论》 1951 年 6 月号，第 288～289 页。

在假定货币边际效用不变的同时，还假定不同的阶级所支出的货币量与所得的满足量是相同的。他说：“可以认为，一定量的东西不但在任何一个人与其他一个人之间，而且在不同集团代表成员之间，都得到同量的满足。”^①可见，庇古认为效用是可测的且具有人际间的可比性。

1932 年罗宾斯出版了《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对庇古的观点即个人间效用比较的可能性进行了批判。罗宾斯指出：“没有办法能够检查出，在和 B 比较之后，A 的满足的大小。……内心省察不能使 A 衡量 B 的心理活动，也不能使 B 衡量 A 的心理活动。因此，没有办法对不同人的满足加以比较。”^②罗宾斯对庇古的批判在当时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批判过程中，罗宾斯借用了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即帕累托（V. Pareto）提出的“最优状态”概念。帕累托在分析最优状态时又采取了同时代的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斯（F. Y. Edgworth）使用的“无差异曲线”（Indifferent Curve）和“契约曲线”（Contract Curve）的概念。埃奇沃斯在运用边际效用学说“研究各个人力求达到自己的最大效用以及各个人彼此之间的协议”时，应用几何图形画出无差别曲线和契约曲线，表示两个人各有一种商品在完全竞争的交换中达到最为有利的状态。这种分析方法为帕累托所采用。

帕累托为了避免效用计量和加总困难，提出了以“偏好顺序”来代替效用计量，即认为只要根据在市场上观察到的消费者行为——对于不同商品组合的同等、较多或较少偏好，就可以确定各个人在既定的价格和收入条件下所达到的最大偏好状态。这样，就可以应用无差别曲线，以偏好顺序来表示各个人和全体的最大满足。帕累托给“最大偏好状态”下了一个定义：“最大偏好状态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它的任何微小的改变，必然使有些人的偏好增多和另一些人的偏好减少。”^③后来，经济学家把以“偏好顺序”表示满足的理论叫做“效用序数论”，即假定消费者对于各种物品或各组物品都有一种偏好，效用只能用第一，第二，第三……等顺序数目来表示，并且，效用或满足不能相加而只能有水平高低。比如，消费者对外衣的偏好胜过对面包，对面包的偏好胜过对苹果的偏好等。显然，序数效用论者所说的一个人福利的好坏，就是指无差异曲线的高低。不仅如此，序数效用论者认为效用不能相加，一个人所得的效用总量无法比较，各个人得到的效用或满足的大小，也是无法加以比较的，如

①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几个方面》，载《美国经济评论》1951 年 6 月号，第 292 页。

②罗宾斯：《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35 年英文版，第 139~140 页。

③帕累托：《政治经济学教本》，意文 1906 年版，引自法文译本 1927 年第二版，第 354 页。

富人和穷人从不同收入所得到的效用或满足无法比较。

序数效用论被认为是一种比基数效用更广泛和更能反映消费者行为的分析方法，并为后来的大多数福利经济学家（新福利经济学家）所接受。但是，序数效用无法提供相对充分的人际间效用比较方面的信息，而使用基数效用却可以获得人际间比较方面的充分信息，从而可以得出一定的社会排序。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西方福利经济学出现向效用主义和基数效用理论回归的趋势。

三、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剩余的概念最初是由法国工程师杜皮特（J. Dupuit）在 1850 年提出的，但消费者剩余概念的真正普及化是在马歇尔（A.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出版之后。马歇尔把消费者剩余定义为：“人们不愿失去某种东西，而愿意支付的价格超过其实际支付的部分”。^① 即消费者消费某种商品一定数量所获得的总效用超过其为此所花费的货币的总效用，表示了单一商品价格的升降引起消费者福利增减的额度。在几何上，马歇尔用了需求曲线之下与代表消费者实际支付的矩形面积之上的那个三角形面积来测度消费者剩余。如图 2—1 所示，消费者剩余由曲线三角形 $\triangle APB$ 所组成的面积，其中 OP 是物品的价格。

应该指出，上面关于消费者剩余的表示方法是一种简单、粗略的度量，为此，有必要介绍一种最接近马歇尔原始定义的度量方法。在图 2—2 中， Y 轴表示货币量， X 轴表示所考虑问题中的商品量， AB 为预算线（满足方程 $Y + P_x X = C$ ，其中 C 为个人可支配收入， P_x 为 X 商品的价格）。于是， X 商品的价格就由 AB 直线的斜率的绝对值给出，即 $P_x = FP/AF$ ，由于 I_1 是与 AB 预算线相切的最高位置的无差异曲线，但消费者是准备付出 FR 量的货币来 ON 量的 X 的，因为在 R 上，消费者处于与没有消费商品 X 的初始 A 相同的效用水平上。因此，按马歇尔的定义，消费者剩余等于 $FR - FP = RP$ ，即为消费者愿意付出的货币量和其实际付出的货币量之间的差额。

^① 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nd, p.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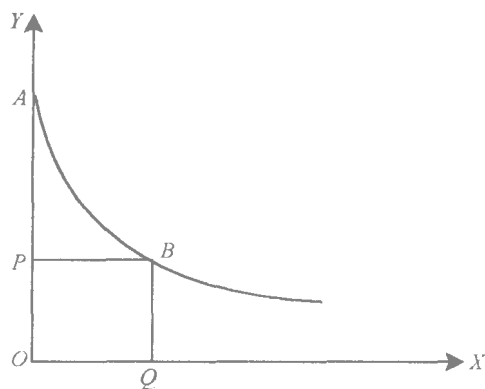


图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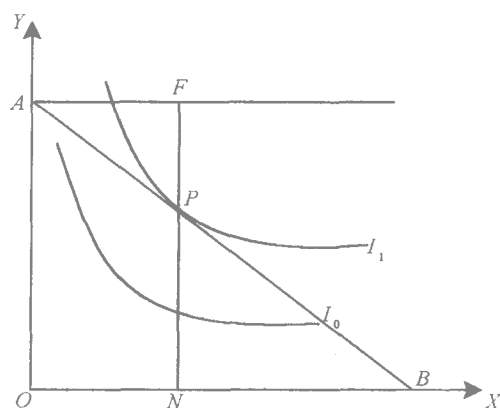


图 2—2

这里，有必要再来看看消费者剩余是如何产生的。我们知道，消费者对每一单位商品所支付的代价只等于该商品最后一个单位的价格。但是，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于消费者而言，前面的单位要比最后的单位具有更多的价值，即“物以稀为贵”。因此，消费者在每一个前面的单位中都得到了剩余。当交换进行到不再对其有利、不再使其得到剩余时，其便会停止购买。可见，消费者所得到的好处并不是从售卖者那里剥削来的，通过商品交换，一方的所得并不是另一方的所失。通过商品交换，交易双方的福利都可以增长。

下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生产者剩余的概念。所谓生产者剩余，是指生产者的实际所得和生产者的期望所得之间的差额，可以用供给曲线之上和价格线之下那块曲边三角形的面积来度量。如图 2—3 所示， SS' 为供给曲线， OQ 为商品 X 的供给量（在价格 P 下）， OP 为商品 X 的价格（在供给量 OQ 下），生产者剩余为 PBS 的面积。之所以会产生生产者剩余，原因在于生产者出售每一单位的所得是按最后一单位商品的价格计算的。但是，根据相对边际成本递增的基本规律，最后一单位产品的成本（从而卖价）必然大于前面单位产品的成本（卖价）。因此，生产者在出售的每一个前面单位的商品中都得到了剩余。在交换不再对其有利、不再使他得到剩余时，其便会停止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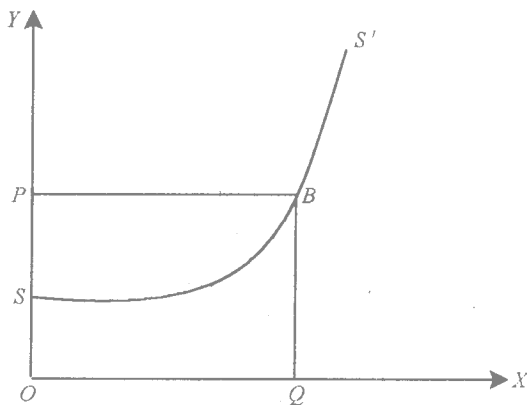


图 2—3

四、消费者剩余分析的应用

尽管有人认为消费者剩余的概念是多余的，或者至少被认为用消费者剩余来测量福利的变化的理论是有疑问的，但它仍被用于成本—收益分析和政策制定上。在此列举两个简单的例子，看看消费者剩余的作用。

（一）税收、补贴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先看看营业税类型的间接税对社会带来的损失。如图 2—4 所示，对商品 X 征收 AB 单位的营业税使价格从 P_1 上升到 P_2 ，价格上升使消费者剩余减少了四边形 $P_1 P_2 AC$ 的面积，但税收所得仅仅是四边形 $P_1 P_2 AB$ 的面积，而谁

都没有获得 $\triangle ABC$ ，显然， $\triangle ABC$ 是净社会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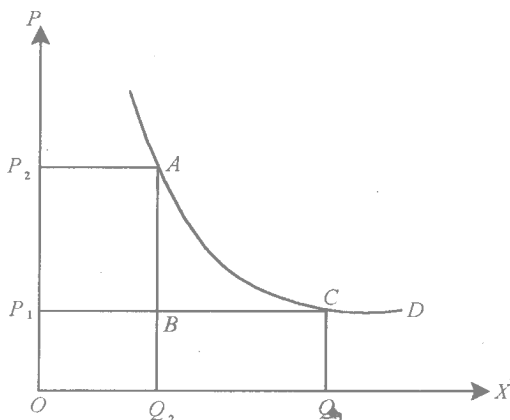


图 2—4

下面进一步考虑对生产者的影响。在图 2—5 中， SS' 是原来的供给曲线，征收 Ea 单位的间接税使供给曲线 SS' 平移至 ss' 。这时，消费者剩余的损失为四边形 $caAC$ 面积，生产者剩余的损失为四边形 $CAEF$ 面积，税收所得为四边形 $caEF$ 面积。于是，净社会损失为 $\triangle AaE$ 。这里，也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推出社会净损失额，即从生产量和需求量的减少入手。减少 Hh 单位的 X 所节约的资源价值为 $HhEA$ ，但这些数量的商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价值为 $HhaA$ ，纯损失为 $\triangle AaE$ 。

我们进一步来分析补贴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在图 2—5 中，假设原来的供给曲线是 ss' ，通过 aE 单位的价格补贴，使供给曲线垂直下移到 SS' ，均衡供给量从 Oh 增加到 OH ，这时，补贴开支为四边形 $RTAC$ 面积，消费者剩余增加量为四边形 $caAC$ 面积，生产者剩余增量为四边形 $Rtac$ 面积，而四边形 $Rtac$ 与四边形 $ACFE$ 相等，显然：

$$RTAC - (caAC + RTac) = \triangle TaA > 0$$

即补贴带来社会净损失 $\triangle TaA$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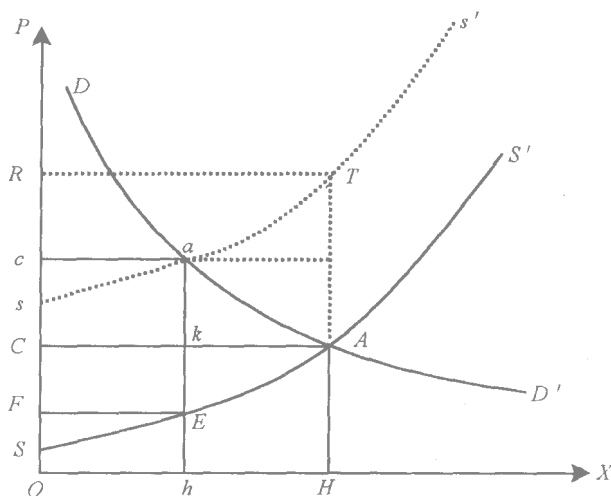


图 2—5

(二) 限定价格、限定产量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先来对政府通过制定最高限价来干预市场的绩效进行考察。如图 2—6 所示，最高限价为 ob ，均衡价格为 oc 。由于法定限价低于均衡价格，使得供给量从 on 减为 om ，消费需求则增至为 oy 。这时，消费 X 商品的边际效用在均衡价格 oc 以下的取低边际效用值的消费者也能消费商品 X ，导致 X 商品供给短缺量为 Δym ，使得那些对商品 X 的边际效用高于均衡价格 oc 的消费者消费欲望难以得到满足，最终，消费者的总效用只能近似地等于 om 与 oy 之比与四边形 $oyhd$ 面积的乘积，与制定最高限价前的均衡消费量 on 相比，损失等于 $oned - om/oy \cdot oyhd$ ，只要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就可证明此值大于四边形 $mnef$ 面积，再减去减少产量节约的生产要素价值 $mnef$ ，则净损失将大于 Δfeg 。实际上，可以证明净损失大于 $om/oy \cdot \Delta ced$ 。并且，如果需求曲线 dd' 的 d 端非常高的话，则纯损失量会是 Δfeg 的许多倍。当然，对消费 X 商品拥有较高边际价值的消费者可能会更早地去搜寻、排队等待，因而这些人得到该商品的概率较大， om 量的商品 X 的实际总效用可能会大于 $om/oy \cdot oyhd$ ，但这是没有考虑搜寻、排队的成本、短缺引起的心理负担和不平等成本因素。

类似分析可应用到限定产量的情形。如图 2—6 所示，限定商品 X 的产量为 om ，这时，商品 X 的价格上升至 oa ，供给短缺为 Δmn ，短缺引起的损失为